

国际友人眼中的毛泽东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眼中的毛泽东 “正在改变世界的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领袖”

□ 马瑞欣 张珊珍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位非常传奇的女性。作为一名进步美国记者和作家，她一生都在追求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苏联、中国、墨西哥、西班牙、危地马拉……这些发生激烈革命的地方都能看到她活跃的身影。1925年后，她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多次访问中国，出色地向全世界人民介绍正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1958年后，斯特朗终于来到中国定居，因为她认识到：“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

在中国期间，斯特朗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在武汉东湖宾馆中……她和毛泽东进行了多次畅谈。在她留下的大量新闻报道和多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中，多次写到她和毛泽东的交往，可以称得上是最了解毛泽东的国际友人之一。

“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斯特朗最早为中国人所熟识的，是她首次向世界报道了毛泽东的那一句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那是1946年，61岁的斯特朗第五次来华。8月6日，斯特朗乘坐延安北关美军观察组的卡车，在翻译陆定一和马海德的陪同下，来到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一排四孔窑洞前，第一次见到了世人传说中的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

斯特朗回忆毛泽东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魁梧，毫无拘束……在乱蓬蓬的浓黑头发的下面，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

正式谈话开始后，斯特朗提出了许多国际国内的问题，毛泽东都一一作了解答和阐述。在谈到美帝国主义时，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篇谈话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和美国记者安

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让斯特朗记忆深刻的还有毛泽东当时用的“纸老虎”这个词。因为英语中没有这个组合词，因此担任翻译的陆定一将它翻译成英语中接近的用词“稻草人”（Scarecrow）。然而，通过自学听得懂若干单词的毛泽东马上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翻译不能表达他的本意。纸老虎不是用来吓唬麻雀和乌鸦的稻草人，而是用纸糊的、吓唬小孩子的老虎，应该翻译成paper-tiger，看起来很害怕，但一遇到水就会发软，就会被冲掉。毛泽东生动的比喻让斯特朗忍俊不禁。

这次谈话不仅让斯特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深刻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她评价：“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斯特朗在延安一住就是7个月，直到1947年初离开。其间她多次见到毛泽东，或在聚餐会上，或在京戏台子前，通过采访，斯特朗认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他对人类的将来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明显地是十分乐观的”

毛泽东让斯特朗深深感动的，是“他对人类的将来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明显地是十分乐观的”。不管当下多大的暴风雨，多么黑暗，他沉浸于自己的信念中，同时愿意与别人分享最后将得到证明的信心。

斯特朗定居中国后，分别在1959年3月、1964年1月和1965年11月3次与毛泽东相见并进行长谈。这3次长谈主要围绕当时的国际局势，包括中美关系问题。1959年3月，斯特朗陪同美国黑人作家杜波依斯及其夫人谒见毛泽东。在宾无拘无束的交谈中，杜波依斯对美国杜勒斯发起中东事件深表忧虑，毛泽东却说希望美国军队在黎巴嫩驻扎更长时间。此言一出，包括斯特朗在内的几

位谈话者都困惑不解。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解释：中东事件是“非常有教育的”，杜勒斯制造整个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有利。他制造的国际局势越紧张，世界人民就越容易动员起来。每个人都将被迫面对战争的问题，杜勒斯本人现在也开始认识到这点，制造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毛泽东接着列举在过去14个月中，由于杜勒斯制造紧张局势而引发的12起世界性事件，包括委内瑞拉的反叛、伊拉克革命等，一一证实他的判断，让在座者颇有云开见月之感。

1964年1月斯特朗参加的谈话涉及美苏的核竞争，在座的一位美国友人引述当年西方报刊的共同主题，即美国把苏联视为眼前的对手，而把中国看成是将来的敌人。毛泽东接着话题说：现在帝国主义看不起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但是，帝国主义的轻视对我们并没有害处，实际上，还有好处。帝国主义者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把眼前的敌人看得比将来的变化的预测更为严重。“就将来而言，”毛泽东肯定地说，“帝国主义没有将来”！

斯特朗后来不得不承认：“毛说出了远比我当时的理解多得多的东西。他没有谈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但却说出了一些使我们其后几个月一直思考的一些观点。”

“他在严肃的评论和玩笑中表现出来的活泼、生动，就像是一出使人喝彩的心灵戏剧”

从第一次在杨家岭窑洞中的谈话开始，斯特朗就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在她心目中，这个无论是指挥百万雄兵，还是引领世界最大国家的领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泰然自若、举重如轻。1965年11月斯特朗与毛泽东最后一次相见，毛泽东已经年过七十，但在斯特朗眼中，毛泽东根本不像一个老者。他身体强壮，神态轻松，语气坚定有力，自如地把谈话带入一种随便的、

同志式的气氛中。斯特朗回忆：“这种交流不仅是对在场的美国人的，而且也是对在场的所有人的，包括年轻的翻译以及给我们送茶、站在一边聆听的服务员们。没有什么壮观的场面和外部表现，表明与我们谈话的是正在自我改造、同时也正在改变世界的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领袖。”

用女性特有的细腻而富有情感的笔触，斯特朗记述她眼中的毛泽东：他是平易近人的。斯特朗陪同杜波依斯一行在武汉东湖宾馆再次见到毛泽东，是毛泽东离开延安10年后第一次接见美国客人。那天，毛泽东穿着一身制作精致的灰制服走下台阶，行动敏捷，精力充沛，轻松愉快，谈笑风生。乍一相见，毛泽东对杜波依斯的肤色感到惊异，还伸出自己的手背和杜波依斯比较说：“你的皮肤不比我黑。”这样的谈话开场，让主宾双方初次见面的拘谨烟消云散。

他是幽默、风趣的。虽然毛泽东在与人谈话中常采取主动，但并不具攻击性。他总是靠着椅背，悠闲地抽着烟，有时通过赞美对方引起话题；有时则通过见缝插针提问；更经常的则是以开玩笑的方式，发表十分幽默的评论刺激对方发言……

他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他的脑子显然是所有人当中最有生气的，他谈起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十分轻松”。当有人提出要多听他的意见看法时，毛泽东会巧妙地回避：“我想先听听他人的意见，民主嘛！”于是，他就会成为投入的、积极的听众，关注着每个人谈话中疏忽及未被注意的细枝末节。

他是轻松自如的。毛泽东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没有紧张、没有忧虑和没有繁重职责的人，尽管他实际上三者都有。“他在严肃的评论和玩笑中表现出来的活泼、生动，就像是一出使人喝彩的心灵戏剧”。

斯特朗将毛泽东的这些个人魅力归因为他的博学多才，是他“对于过去、现在及将来、从生物出海尚未进化成现在，直到人和地球像我们所知的那样终结之时的人类的潮流和其历史的深知”。



在黑龙江省北安市，有一个镇叫赵光镇，火车站也叫赵光站，赵光的名字在这片土地上家喻户晓。1945年12月19日，时任通北县秘书的赵光被叛匪杀害于火车站，之后被安葬于此并修建了纪念碑。纪念碑高5米，混凝土梯形结构，上窄下宽，尖顶上插有一枚红色铁质五角星。正面和南面（面朝站台）上书红色大字：赵光烈士纪念碑，顶部均雕刻着红色中国共产党党徽图案。背面和北面刻着碑文。无论是路过的行人，还是坐火车来往于此的旅客，都会投来致敬的注目礼，缅怀这位血洒黑土地的烈士。在平时，也会有许多老师和家长带孩子们来到此地敬读碑文，讲述赵光烈士的英雄事迹。碑文全文如下：

赵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员，原籍河北省人，生于一九二二年，贫农出身，十七岁参加革命，曾长期在敌后工作，后到延安抗大学习。八·一五来东北被派通北县政府秘书，具有卓越的工作能力和良好的革命作风，（为）敌伪反动派所注意。竟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在通北站被苏叛匪的既定阴谋而枪杀。赵光同志：你的牺牲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事业，你坚贞不屈的英雄行为激起了千百人的愤怒，誓为死者报仇！同志让我们亲切的告诉你，通北的人民已经翻身作了主人。过去统治人民的统治者，都被打得粉碎。我们的部队打到江南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宣告灭亡。全中国最后解放就要到来。你安息吧！我们是胜利了，为了永永远远的纪念你，把这个地区改为赵光区，这个车站改为赵光车站。你的英名，会与世同流。

通北县人民全体敬立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

碑文简要介绍了赵光烈士的革命经历，阐明对反动势力的愤慨之情，告慰烈士通北人民已翻身做主人，迎来全国解放和幸福生活，同时表达了通北人民对烈士的无限缅怀，读来深受教育，令人动容。

（一）

1922年8月，赵光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专门请人为他起名“光彩”，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给赵氏家族增光添彩，光宗耀祖。受外祖父的熏陶，他自幼便开始诵读唐诗宋词，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经常给石家庄、北京的报馆投稿。

赵光参加革命后不久，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农会、区宣传部干事，县青救会宣传部长、会长，县抗日救国会主任等职。1939年，赵光在藁城县主办《大众生活报》《建国报》时参加了藁城县暴动，在组织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被反动派通缉后，到北京做地下交通员，担任中共北京地下党负责人刘仁的秘书。1942年5月，党组织为了更好地培养他，将他送到延安学习。他先考入鲁迅艺术学院，后又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并任抗大支部委员会委员、总支书记。

赵光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十分刻苦。他深切地意识到，参加革命不是让自己和家人觉得有光彩，而是为了劳苦大众谋幸福，去追求光明，像火一样发光发热。于是，在文科教师朱子奇的建议下，他将名字由赵光彩改为赵光。名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寓意完全不同，时刻激励着他，坚定追求进步与光明，为党和人民增光添色。

（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赵光毅然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延安干部团，不远万里来到黑龙江省北安，参加革命

一束闪亮而夺目的光

——赵光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曲晓溪 牛升海 刘淑滨

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此时的黑龙江省，形势十分复杂。日本投降后，各地政权由伪满残余和地主豪绅组成的“维持会”把持，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在通北，原伪满的一名营长率领两个连的兵力，接收了通北县政权，成立了通北县民众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国民党政府正式接收。中国共产党进入通北开展工作后，该维持会撤离。11月16日通北县民主政府成立。11月18日，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任命延安干部李仰南为中共通北县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光为通北县民主政府秘书，进驻通北。

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要站稳脚跟，最关键、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做好建党建政工作，让红色政权迅速运转起来。在距离延安上千公里之遥的通北，赵光牢记党的嘱托，和同志们一起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接收和改造旧政权，经过20余天的艰苦工作，赵光对通北县城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基本情况有了全面掌握。他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火热的革命激情、卓越的工作能力和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作风，很短的时间内便在通北县打开了工作局面。

（三）

在赵光和同志们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但通北局势仍然复杂而危险，表面上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通北县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个县大队，其成分十分复杂，大多是日伪时期留用人员，其中有许多暗藏的汉奸、伪满特务和警察，由于接收时间短，还未来得及将他们全面清除出去。这些反动分子暗中活动，密谋串联，勾结土匪，企图扼杀新生的民主政权，随时都可能发生叛乱，暗杀活动也频繁发生。

赵光突出的工作能力，引起了隐藏在内部原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的仇恨。他们把赵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密谋寻机杀害他。1945年12月19日8时左右，赵光赴北安向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汇报工作。在警卫员邢殿墀的护送下，他冒着凛冽的寒风，坐着斗子车来到通北车站（现赵光站）。在候车室门口，赵光被混入革命队伍的10余名叛匪杀害，时年23岁。

通北县叛乱平息后，经通北县民主政府决定，将赵光追认为烈士。1946年3月20日，通北县为赵光烈士建墓。清明节那天，在通北火车站举行了赵光烈士遗体安放仪式，并为他修建纪念碑。5月1日，通北县通北区改名为通北县赵光区。1949年6月20日，经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员会批准，中国共产党通北县委员会、通北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把通北车站改为赵光站；在赵光车站月台旁重新修建赵光烈士纪念碑，使乘坐火车的旅客和过往行人都能瞻瞻墓碑，缅怀先烈。从此，赵光便成了这片土地的名字。

抗战胜利后东北局领导人的一次授衔

□ 李 波 赵 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战略主动地位，中国共产党决心进军东北。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在进驻沈阳时，因为军衔问题经历了一番波折。为此，中央政治局特地为派遣赴东北工作的彭真、陈云等人授予了相应的军衔。这次授衔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军衔制度的一次有益探索。

中共抢占先机进军东北。经历了长达14年常年累月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道，都在热切期盼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然而，国民党当局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一面要求在华日军向国民党军缴械，一面进军江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挑起内战的企图昭然若揭。

在东北，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斗争赢得了东北人民的信任。国民党军队主要部署在南方，一时难以进到东北，而冀热辽解放区与东北相连，胶东解放区与之隔海相望，这就使中共进军东北占据了地理上和时间上的双重优势。另外，东北地区有着较好的经济实力和工农业基础，又紧邻着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中共能够在此建立根据地，那么将会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局面，获得谋划长期发展的广阔空间。为此，中共在召开七大时就提出了争夺东北的战略设想。

1945年8月，苏军入境东北后迅速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盘

踞在东北长达20余年的日本关东军全部被解除武装。苏军的到来为中共争夺东北带来良好契机。就在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要求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向辽宁、吉林、热河、察哈尔等地进发。一场东北争夺战就此拉开大幕。曾克林、唐凯率东路第十六军分区部队先后扫清山海关外圈残余日军，在苏军炮火的有力配合下，于8月30日攻克山海关，随后乘火车北上接管锦州并抵达沈阳。

曾克林随苏军延安请命。八路军部队进入东北却面临不少麻烦。到达沈阳后，就在战士们欣喜之际，一队全副武装的苏军将列车团团围住，不准他们下车。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随即前往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苏联红军入境东北后，日本战败投降，苏军在东北地区各主要城市实行管制，苏军军官负有领导职权。当苏军卡夫通少将看到曾克林等人没有佩戴勋章，也没有任何军衔时，认为八路军不是正规部队，便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为借口不准我军下车。

曾克林据理力争，两次找卡夫通交涉，但都以失败告终，双方僵持不下，谈判陷入胶着。第三次找卡夫通交涉时，双方的情绪越发激动，同去的唐凯把自己的袄袖子卷起来，露出了他1930年在湖北参加红军时臂膀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苏维埃

标志，高声说：“共产党！毛泽东！”看到这些，卡夫通似乎明白了这支军队的属性，通过交谈他接受了曾克林的建议，找来一位苏军政工干部格拉钦克一起谈判。最终，苏军虽然勉强同意八路军部队下车，但仍要求他们驻到离沈阳30公里以外的苏家屯去。

为了顺畅中共与苏联方面在东北的关系，随苏军返回东北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向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建议派飞机去延安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不久，苏军总司令部指派了一名懂中文的上校卫斯别夫和曾克林于1945年9月14日乘苏联军用飞机飞赴延安。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尚不清楚日本投降后东北的详细情况，曾克林和卫斯别夫的到来解决了难题。当天下午直至晚上，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授衔配合中苏协作。在详细了解到东北的形势以及苏军的态度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下決心全力挺进东北，并当即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东北中央局（习惯上称为“东北局”）。中央政治局决定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人去东北工作，要求他们立即同卫斯别夫乘苏联飞机一起出发。考虑到与苏军的接洽事宜，临行前中央政治局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为他们特别授予了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由当时的总参谋长叶剑英宣布了

中央这个决定。

派去东北的干部各有所长，中央政治局按照工作分工为他们颁授了相应军衔。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从事革命工作，有着领导白区斗争的丰富经验。陈云早期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他们同为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又一起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叶季壮专长经贸工作，在物资管理和经贸往来方面工作经验丰富。在新组建的东北局中，彭真任书记，陈云、叶季壮任东北局委员，三人被一同授予中将军衔。伍修权有一定外事工作经验，早期在苏联留学和工作，此次担任东北局委员，被授予少将军衔。段子俊长期从事党的通讯工作，此次担任东北联络局局长。莫春和主要负责译电工作，此次担任东北局机要处处长。段子俊和莫春和被授予上校军衔。

东北局在沈阳组建后，彭真和伍修权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拜访克拉夫钦科上将与图马尼扬中将，就苏方援助八路军的问题及已入城部队撤出沈阳城的问题进行了商谈。此后，彭真和陈云多次与东北苏军进行协商，并根据与苏军达成的默契向中共中央及晋察冀及山东部队发出电报，汇报东北发展的良好条件，希望各地干部和部队兼程赶来。从此，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一步步走向成功。